



政治信任的制度—文化归因及政府合作效应

张书维 景怀斌

摘要：中国社会的政治信任问题日益突出，是需要正视与解决的重大公共管理问题。本研究通过 767 个城乡居民问卷调查发现，公共政策评价和腐败感知显著影响政治信任。中央政治信任决定于公共政策评价、政治效能、腐败感知、社会信任、政治犬儒主义、权威主义价值观与媒体信任；本地政治信任决定于公共政策评价、政治效能、腐败感知与权威主义价值观。政治信任能促进个体的合作行为，抑制对抗行为。

关键词：政治信任；制度视角；文化视角；合作行为；对抗行为

所谓政治信任，指民众对于政府或政治制度所抱有的信心，相信它们会制定符合民众利益的政策并提供其预期的政策结果(Levi & Stoker, 2000: 475-507)。政治信任是衡量民众与政府之间关系的重要指标，是需要正视与解决的重大公共管理问题。研究中国社会下的政治信任，有两个逻辑相关的基本问题——什么因素决定民众的政治信任？政治信任或不信任又有哪些直接后果？本研究试图探明这两个问题。

一、文献综述与理论假设

政治信任以往的研究通常采用主观报告的问卷法对政治信任进行测量，尽管不同的研究者对于政治信任维度的命名存在差异，但总体而言，能力、动机和诚实或可信度在不同的研究中均有提及，是政治信任包含的重要维度(张婧、王二平, 2010: 1620-1627)，且用于测量中国民众的政治信任具有较好的信效度(Zhang & Wang, 2010: 929-939)。根据信任对象层级的不同，政治信任可划分为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信任，本研究聚焦于此。为避免概念歧义，本研究将政治信任进行如下操作化定义：指民众对(中央和地方)政府机构的信任，即民众对政府的行政工作是否符合民众利益和期望的评价。有关政治信任前因变量的研究主要遵循两个理论视角：制度理论和文化理论(Mishler & Rose, 2001: 30-62)，本研究试图把二者结合，在制度视角和文化视角下进行理论构建和研究设计。

(一) 制度视角下的核心因素

制度视角基于理性选择路径，将政治信任看成是政治制度(政府)运行的后果。核心是政府绩效，高水平的绩效导致民众对于政府信任程度的提高(Wong & Hsiao, 2011: 263-281)。其中，民众对公共政策(过程和结果)评价的好坏、其表征个体对政府响应民众需求之信念的(外部)政治效能感^①以及腐败感知度，可谓政府绩效的直接评价指标；除此之外，还有两个间接指标：一是反映社会不公的相对剥夺，二是生活满意度。在这五个因素中，公共政策评价和腐败感知对政治信任影响的研究结果比较稳定；生活满意度的影响需

^①以往研究主要关注内部政治效能，即个体对自身有能力理解和参与政治的信念。

进一步验证;而政治效能和相对剥夺的影响尚缺乏实证研究的证据。更关键的,这五个前因是否同时对政治信任起作用? 现有研究并未对此加以证实。因此,提出研究假设一:

H1: 制度视角下的公共政策评价、政治效能、腐败感知、相对剥夺与生活满意度至少两个因素同时作用于民众的政治信任,包含 H1a- H1e 五个子假设(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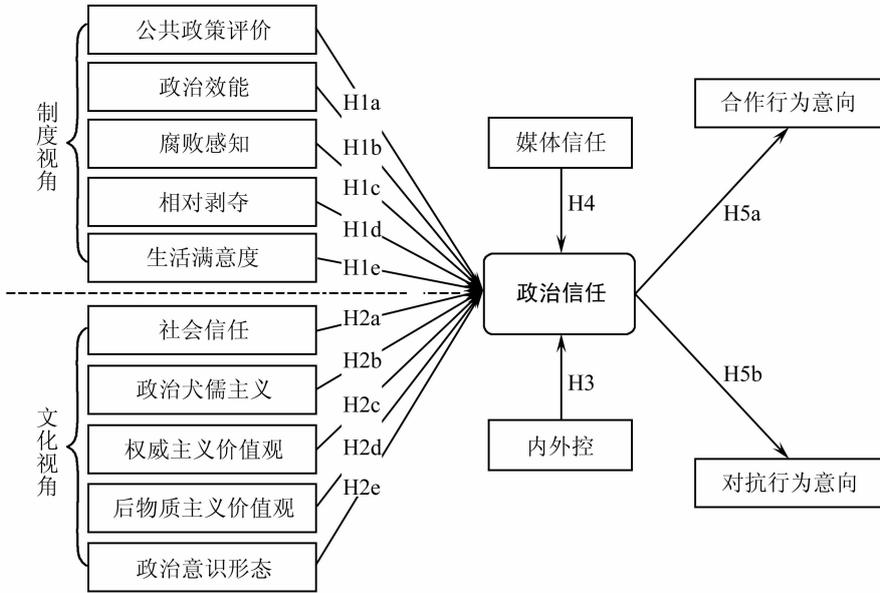


图 1 民众政治信任的前因及结果理论模型

(二) 文化视角下的核心因素

文化视角强调政治社会化过程对于政治信任的影响,也包括了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Shi, 2001: 401-419)。对于社会化过程,研究比较多的一个因素是社会信任。作为一种社会资本,社会信任被视为政治信任的一个重要前因(熊美娟, 2011: 77-87)。但亦有证据表明,社会信任与政治信任之间联系微弱(马得勇, 2007: 79-86)。与政治社会化有关的另一个因素是政治犬儒主义,涉及对政治家、政府及政治制度的不信任。来自美国青少年的研究表明,政治犬儒主义与政治信任负相关(Hoffman & Thomson, 2009: 3-21)。成人世界此结论能否成立,尚需验证。另一方面,有关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权威主义价值观上。这里所谓的权威主义是指儒家文化长期影响下表现出的对权威敏感、权威崇拜及权威依赖。权威主义与政治信任的关系并不稳定(马得勇, 2007: 79-86; Wong & Hsiao, 2011: 263-281)。此外,持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人认为在生活水平达到一定的程度之后,会促使人们的注意力从对物质的追求转移到关注非物质的问题上来,典型如环境问题;而中国公众近年来的价值观已经呈现出由“物质主义”向“后物质主义”转变的趋势(郭莲, 2010: 61-64)。因此,该价值观更可能影响生活在小康水平之上的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最后,政治意识形态也可看作一个影响政治信任的文化因素。西方社会对意识形态的主要区分植根于它们固有的文化传统之中(Jost, et al., 2009: 307-337),中国人的政治意识形态与西方不同。目前未见针对国人的政治意识形态与政治信任的实证研究。

上述文化视角下可能影响政治信任的五个因素中,社会信任、权威主义价值观和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对政治信任影响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而中国背景下政治犬儒主义和政治意识形态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尚缺乏实证研究的证据。更关键的,这五个前因是否同时对政治信任起作用? 现有研究并未对此加以证实。因此,提出研究假设二:

H2: 文化视角下的社会信任、政治犬儒主义、权威主义、后物质主义与政治意识形态至少两个因素同时作用于民众的政治信任;包含 H2a-H2e 五个子假设(见图 1)。

(三) 人格及环境因素

制度和文化视角之外,来自个体内部的人格特质和外部的环境因素也不容忽视。本研究选取内外

控和媒体信任加以讨论。内控者与外控者的区分源自控制点理论：内控者相信自己能够掌握命运，更依靠内心的是非标准指导自己的行为；外控者认为自己的遭遇是由于运气或偶然，更易受外界的影响。面对同样的工作情境，外控者表现得更加顺从，更多选择相信上司(Wang, et al., 2010: 358-367)。因此，内外控人格的差异可能会影响个体的政治信任。与之相对，媒体则从外部对个体的政治信任施加影响。来自美国选举调查的数据发现，政治信任与媒体信任正相关(Lee, 2010: 8-21)。中美两国在新闻制度和媒体环境上差异较大，这一结论的适用性也需要在中国背景下加以验证。综上，提出研究假设三和四：

H3：外控倾向越高，政治信任越高；H4：媒体信任越高，政治信任越高。

(四) 合作行为和对抗行为

民众的政治信任或不信任会导致什么结果？大量研究表明，政治信任与民众对政府的合作行为呈现出较稳定的正相关(张书维、许志国、徐岩, 2014: 588-595)。另一方面，合作与对抗就像一个硬币的正与反，政治信任对于合作行为的促进自然表现为对对抗行为的抑制。这里所谓的对抗行为指个体对政府决策的抵制或不顺从。其特点就是不合作，但并不必然伴随着暴力或攻击。现实生活中，无论合作还是对抗，某次具体行为的爆发往往是偶然的，无法准确预知。故通过问卷调查行为意向来预测作答者的行为反应就成为研究者普遍使用的方法(张书维、王二平、周洁, 2012: 524-545)。

已有研究主要从正面揭示政治信任与合作行为的关系，鲜有从反面探讨政治信任与对抗行为的。基于此，提出研究假设五：

H5：政治信任能够促进民众与政府的合作，抑制民众与政府的对抗；包含 H5a 和 H5b 两个子假设(见图 1)。

本研究的理论模型如图 1 所示。需注意，此理论框架旨在整合现有政治信任研究进展的相关因素，是综合涵盖式的，非研究者简单的理论推测。

二、研究方法

(一) 数据选取

使用本课题组自编的“社会态度问卷”进行调查，问卷分为城市版和农村版。城市版问卷选取广州市中心城区越秀区和海珠区，以及非中心的番禺区，在人流较多的地铁和广场等公共场所随机发放。一共发放 550 份，回收有效问卷 442 份；有效回收率 80.4%。农村版问卷选取广西岑溪市波塘镇和桂平市西山镇、紫荆镇的 8 个村；通过入户调查的形式发放 430 份，回收有效问卷 325 份；有效回收率 75.6%。每名被调查者在完成问卷后，研究人员会赠送一份小礼品以示感谢。

参与调查的城市居民 442 人(男性 255 人，女性 187 人)，平均年龄为 34.58 岁；农村居民 325 人(男性 238 人，女性 87 人)^①，平均年龄为 37.23 岁。

(二) 变量测量

问卷为五点的 Likert 型量表。其中，公共政策评价、政治效能、腐败感知和政治信任的测量，根据对象的不同，分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于测量题项数目 ≥ 2 的变量，本研究采用算术平均值作为变量值的代表。除政治效能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64，其余变量的信度均高于 0.7(篇幅所限，不再一一列举)。题项如下：

公共政策评价。4 题(Zhang & Wang, 2010: 929-939)，让被调查者评价当前中央和本地政府推行的各项政策及推行政策时是否征求老百姓的意见。

政治效能。2 题(Mou et al., 2011: 341-356)，如“大多数中央/地方政府官员能够想人民之所想”。

腐败感知^②。1 题(Melgar et al., 2010: 120-131)：就你的感受而言，你认为中央政府/本地政府的廉洁程度如何？

^① 由于在调查的过程中，女性的拒答率较高，因而造成了农村样本数据中女性的比例偏低。

^② 腐败感知为反向计分，以下“相对剥夺”同。

相对剥夺。4 题(张书维,周洁,王二平,2009:69-77),如“与本地同行/本地农村人相比,您觉得您的个人收入属于什么水平?”

生活满意度。1 个题项,源自世界价值观调查(WVS,2010—2012)^①:总的来说,您对自己目前的生活状况是否满意?

社会信任。1 题:“您认为,社会上的大多数人是可信的吗?”

政治犬儒主义。3 题(Pinkleton & Austin,2002:141-163),如“看起来我们的政府正被少数大的利益集团操纵,这些利益集团只关心自己的利益”。

权威主义价值观。源自亚洲民主调查^②(Asian Barometer),5 题,如“政府首脑就像一家之长,我们应该服从他们的决定”。

后物质主义价值观。1 题(Inglehart & Abramson,1994:336-354):以下四个说法中,请选出您认为最重要的和次重要的:1 维持国内秩序;2 政府制定重要决策时,给予民众更多的话语权;3 抑制物价上涨;4 保护言论自由^③。

政治意识形态。1 题,询问被调查者对中国发展模式看法:“1 为采用美国的模式”,“10 为探索中国特色的模式”^④。

内外控。1 题:“……您认为您对个人生活的控制力如何?”

媒体信任。4 题(Lee,2010:8-21):对电视/报刊/广播/网络四种获取新闻的渠道,按可信度进行选择。

政治信任。3 题(Zhang & Wang,2010:929-939),如“您是否相信中央政府会尽力去做有利于大多数群众利益的事情?”。

行为意向测量(张书维,2013:1410-1430)。使用情境模拟,以“强拆”(城市版)和“征地”(农村版)为背景,设置了一个政府补偿不尽合理的方案^⑤。然后假设被调查者为被拆户,询问其是否愿意迁走(测量合作行为意向)或抵制搬迁(测量对抗行为意向)。

(三) 分析工具

本研究采用 AMOS20.0 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通过结构方程模型(SEM)技术考察政治信任的前因变量和结果变量间关系。SEM 对样本量的要求为 10 倍于测量变量(侯杰泰、温忠麟、成子娟,2004:125-127)。根据图 1,本研究所关注的变量共 15 个;有效样本数城市为 442,农村为 325;样本量完全满足分析需要。在分析中,选取以下常用指数作为模型拟合度的判断标准:比较拟合指数(CFI)、规范拟合指数(NFI)与近似均方根误差(RMSEA)。一般来说,CFI 和 NFI 大于 0.90, RMSEA 小于 0.08,说明模型拟合较好(Hu & Bentler,1999:1-55)。

三、结果与分析

(一) 中央政治信任的前因变量及其对居民合作和对抗行为意向的影响

首先根据图 1 的理论模型对城市样本的中央政治信任模型进行拟合^⑥。初步结果如下: $\chi^2 = 102.28, df = 53, p = 0.000$; CFI = 0.96, NFI = 0.93, RMSEA = 0.05。p 值小于 0.001,表示理论模型与结构模型不契合。于是对模型进行修正^⑦,得到最终模型(见图 2)。该结构模型拟合情况良好: $\chi^2 = 11.74, df = 13, p = 0.55$; CFI = 1.00, NFI = 0.99, RMSEA = 0.00。公共政策评价、腐败感知、社会信

①生活满意度的测量题项为 WVS(2010-2012)问卷的 V23。以下“社会信任”源自 V24,“内外控”源自 V55。问卷见 http://www.worldvaluessurvey.org/index_surveys。

②该问卷调查为期三年(2001—2003),调查范围覆盖中国(分大陆、台湾、香港三个地区)、日本、韩国、菲律宾、泰国、蒙古。详见: <http://www.asianbarometer.org/newenglish/introduction/Surveytimetable.htm>。

③分析时经过编码处理,得分 1 为物质主义,2 为趋中派,3 为后物质主义。

④该题不同于其它题,用了 10 点测量,为了更好地辨明作答者的政治意识形态(倾向)。选项越靠近 1,说明越倾向于自由主义,越靠近 10,说明越倾向于“新左派”(徐有渔,2006:101-115)。

⑤该方案要求被拆户接受政府的补偿方案并在限期内迁走,否则其住房会被视为非法建筑,将实行强拆。

⑥公共政策评价、政治效能、腐败感知的变量均为中央级,政治信任为中央政治信任。以下“农村样本的中央政治信任模型”同。

⑦做法:先将路径系数不显著的路径及变量去除,再根据部分前因变量与结果变量相关(限于篇幅文中未予显示),建立起所有前因变量与合作和对抗行为意向的联系,变政治信任为部分中介。最后去除不显著的路径及变量。以下三个模型同。

任、政治犬儒主义、权威主义价值观与媒体信任合起来对中央政治信任的解释方差 $R^2=0.59$ 。

其次根据图 1 的理论模型对农村样本的中央政治信任模型进行拟合。初步结果如下：

$\chi^2=104.79, df=47, p=0.000; CFI=0.94, NFI=0.90, RMSEA=0.06$ 。 p 值小于 0.001, 对模型进行修正得到最终模型(见图 3)。该结构模型拟合情况良好： $\chi^2=13.58, df=10, p=0.19$ ；

$CFI=0.99, NFI=0.98, RMSEA=0.03$ 。公共政策评价、腐败感知、政治效能、社会信任与媒体信任合起来对中央政治信任的解释方差 $R^2=0.65$ 。

综合城市与农村样本的中央政治信任模型, 可发现: 制度视角下的公共政策评价与腐败感知是政治信任稳定的前因变量, H1a 和 H1c 得证。政治效能的作用只出现在农村模型中, H1b 部分得证。文化视角下比较稳定的前因变量是社会信任, H2a 得证。政治犬儒主义和权威主义价值观的作用只出现在城市模型中, 且二者分别对合作行为和对抗行为有直接影响, 因此 H2b 和 H2c 部分得证。此外, 媒体信任这一外部因素对政治信任亦有稳定影响, H4 得证。政治信任对合作行为意向和对抗行为意向的作用稳定, 两模型均一致地显示政治信任越高, 越能促进合作行为, 抑制对抗行为, 故 H5 得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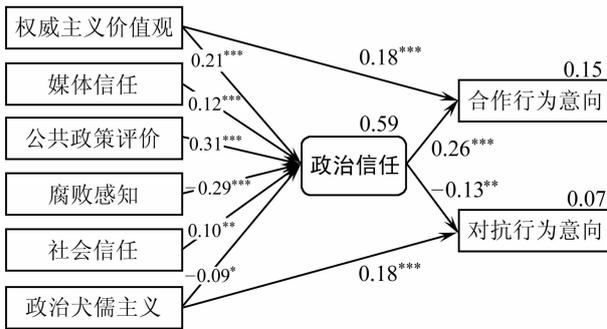


图 2 中央政治信任的前因及结果变量(城市)

注: $n=442$; * $p<0.05$, ** $p<0.01$, *** $p<0.0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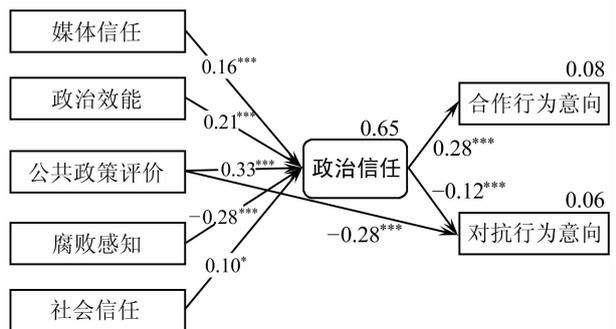


图 3 中央政治信任的前因及结果变量(农村)

注: $n=325$; * $p<0.05$, ** $p<0.01$, *** $p<0.001$

(二) 本地政治信任的前因变量及其对居民合作和对抗行为意向的影响

数据分析方法与之前对“中央政治信任”的分析一致, 只不过此处的公共政策评价、政治效能、腐败感知和政治信任为本地级变量。结果如下:

图 4 为城市样本的本地政治信任模型。该结构模型拟合情况良好： $\chi^2=0.60, df=3, p=0.90$ ； $CFI=1.00, NFI=1.00, RMSEA=0.00$ 。公共政策评价、政治效能、腐败感知与权威主义价值观合起来对本地政治信任的解释方差 $R^2=0.56$ 。

图 5 为农村样本的本地政治信任模型。该结构模型拟合情况良好： $\chi^2=8.20, df=6, p=0.23$ ； $CFI=1.00, NFI=0.99, RMSEA=0.03$ 。公共政策评价、政治效能、腐败感知与权威主义价值观合起来对本地政治信任的解释方差 $R^2=0.47$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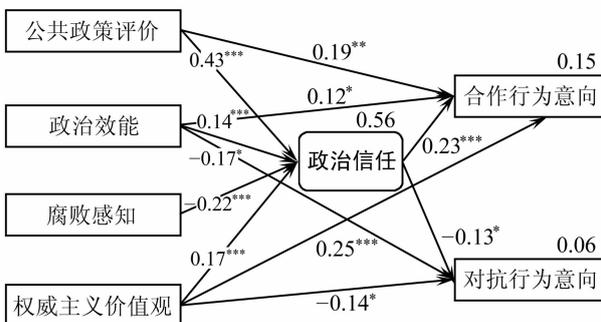


图 4 本地政治信任的前因及结果变量(城市)

注: $n=442$; * $p<0.05$, ** $p<0.01$, *** $p<0.0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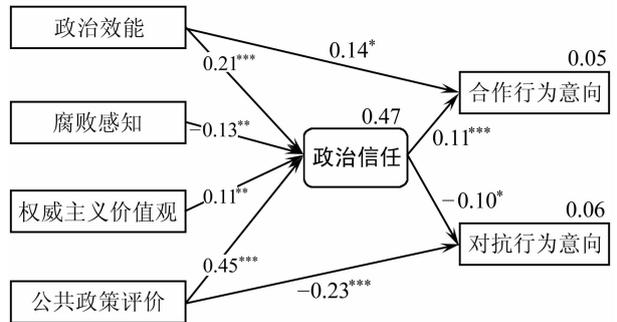


图 5 本地政治信任的前因及结果变量(农村)

注: $n=325$; * $p<0.05$, ** $p<0.01$, *** $p<0.001$

综合城市与农村样本的本地政治信任模型,可发现两个模型涉及的政治信任前因变量相同。包括制度视角下的公共政策评价、政治效能与腐败感知(H1a、H1b和H1c得证);文化视角下的权威主义价值观(H2c得证)。政治信任仍为前因变量与结果变量的部分中介。在具体的作用路径上,两模型有所差异:城市模型中,公共政策评价正作用于合作行为意向,政治效能和权威主义价值观分别正作用于合作行为意向,负作用于对抗行为意向;农村模型中,政治效能正作用于合作行为意向,公共政策评价负作用于对抗行为意向。比较而言,城市模型显得更加复杂。此外,政治信任对合作行为意向和对抗行为意向的作用稳定,两模型均一致地显示政治信任越高,越能促进合作行为,抑制对抗行为,故H5得证。

四、讨论

(一) 政治信任的制度—文化归因

综合中央政治信任和本地政治信任的四个模型,可发现制度视角下的公共政策评价和腐败感知是政治信任的共有前因。本研究证实无论城乡,不分层级,公共政策评价均是政治信任稳定的前因变量,对一定时期内推行的公共政策的评价越好,民众的政治信任也越高。另一方面,腐败作为民众深恶痛绝的政治丑恶现象,直接动摇着民众对执政者的信心。四个模型一致显示,民众的腐败感知越明显,政治信任越低。政治效能的作用在城市样本的中央政治信任的模型(见图2)之外的三个模型中得到证实,表现为民众的政治效能感越高,政治信任越高;说明政治效能也是政治信任一个比较稳定的前因变量。考虑到城市调查样本取自广州,样本的局限是可能导致政治效能在中央政治信任模型中效应不明显的—一个原因。相比于公共政策评价、腐败感知和政治效能这三个政府绩效的直接评价指标,相对剥夺和生活满意度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在本研究中未得到证实。这可能源于现实中导致民众产生相对剥夺感和生活不满意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政府是否作为只是其中之一。

文化视角下政治信任的前因的作用不尽一致。其中,社会信任在城市与农村样本的中央政治模型中出现;权威主义价值观的影响则在除农村样本的中央政治模型之外的三个模型中得到证实。此外,城市样本的中央政治模型还发现了政治犬儒主义的影响。毋庸讳言,传统文化对政治信任的影响是复杂的,且存在不同地域与人群之间的亚文化。因此,本研究虽没有得出文化视角下影响政治信任的稳定前因,但上述三个在不同模型中显现效应的因素仍有价值。首先,社会信任是对陌生人的信任,无论是中央政府抑或本地政府,作为一个符号化的政治形象,对于普通民众而言,都是有距离的。而不信任他人的人一般也不会信任那些政治职位上有权利诱惑的人。因此,社会信任与政治信任存在正相关。其次,无论真实绩效如何,威权体制下的政府作为最大的社会权威,自然容易引起高权威主义价值观人群的崇拜和依赖。故权威主义价值观与政治信任存在正相关。第三,持政治犬儒主义的人表现出对政府及其官员的习惯性排斥,对政治信任当然是起负作用。最后,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和政治意识形态对政治信任的影响没有体现,可能跟中国的国情有关。后物质主义是发达国家在进入后工业社会时出现的一种新型价值观,而当下中国从总体而言仍处在工业化中期,急剧的社会变革容易放大市场的竞争和风险,使得民众更加缺乏安全感(Wong & Wan, 2009:497-515)。因此,建立在衣食无忧基础上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影响还不够广泛和深入。改革开放以来,国人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思潮走向多元。目前缺乏对国人政治意识形态的有效测量(刘取芝、孙其昂、施春华、陈友庆, 2013:2073-2081)。本研究也仅用一道题项,相对粗糙,这可能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政治意识形态作用的发挥。

制度视角和文化视角之外,研究者各选取了一个内部和外部因素探讨其对政治信任的影响。结果表明,源自个体内部的人格因素——内外控对政治信任无显著影响,源自环境的外部因素——媒体信任对中央政府的信任有正效应。这一结果从另一角度说明政治信任作为一种机构信任,与人际信任的不同。媒体信任没有建立起与本地政治信任的正向关系,一个可能是本地媒体的公信力不足。面对当地同一事件,当地民众更愿意相信中央媒体(如央视的焦点访谈栏目)报道的真实性。

综上,制度—文化归因是解释政治信任的主要理论框架。

（二）政治信任的政府合作效应

合作与对抗行为意向作为政治信任的结果,在四个模型中显示出一致且稳定的影响:一方面,民众的政治信任越高,越能促使其在与政府的互动中采取合作的行为策略;与此同时,越能抑制其在与政府的互动中采取抵制或对抗的行为策略。本文将这一结果概括为“政治信任的政府合作效应”。当然,研究中对行为意向的测量严格说来只能算是行为的一种准备状态。除了政治信任,公共政策评价、政治效能、政治犬儒主义和权威主义价值观也都分别对行为意向直接产生作用(见图2-图5)。而四个模型的解释方差,最高的也只有0.15(均出现在城市政治信任模型中的合作行为意向上,见图2和图4)。这恰恰印证了现实中决定民众采取何种行为来应对政府的原因是复杂的,有时甚至是难以预测的,很难在一个理论模型中穷尽所有可能的因素。此外,这也说明了政治信任为何只部分中介了前因变量和结果变量之间的关系。但在这些因素中,政治信任无疑是关键。研究中仅通过情景模拟使被调查者卷入并加以测量,即在结果中证实了政治信任对合作行为意向和对抗行为意向影响的鲁棒性;若在真实的情境下,当与政府互动的当事人是自身时,政治信任对个体行为必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发现和启示

本研究将政治信任的前因和结果变量纳入同一个框架分析,在城市和农村的不同样本中印证了:公共政策评价、腐败感知、社会信任与媒体信任对中央政治信任的影响,公共政策评价、政治效能、腐败感知、权威主义价值观对本地政治信任的影响;且证实了政治信任对合作行为意向和对抗行为意向的影响表现出跨行政层级和样本地域的稳定性。这在现有的研究中尚属首次。所得结果无论从深度上还是广度上都是对已有研究领域的发展。

实践中,无论中央政府还是当地政府,要想取信于民,需从制度和文化建设两方面入手。具体而言,首先要在政府绩效上下足功夫。特别要重视公共政策的有效实施和反腐工作的深入开展。更进一步,在制定和执行相关政策的时候,不仅要考虑政策结果,还需要考虑政策制定过程中民众的意见表达。而如何将反腐制度化常态化而非仅依靠轰轰烈烈的“反腐败运动”,在不断查获腐败官员的同时不影响民众对政府整体形象的判断,是需要上至中央下至地方执政者认真思考的。同时,提高政府对民众需求的响应能力,在全社会范围内倡导并培育信任文化,抵制政治犬儒主义的侵扰,都能显著改善民众的政治信任。此外,合理看待权威主义,正确运用媒体工具,这也都有益于政治信任的建立和维护。一旦获取了民众的信任,民与官的互动中便多了合作,少了对抗,这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 [1] 郭 莲 (2010). 中国公众近年价值观的变化:由“物质主义价值”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转变. 学习论坛, 10.
- [2] 侯杰泰、温忠麟、成子娟 (2004). 结构方程模型及其应用.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 [3] 刘取芝、孙其昂、施春华、陈友庆 (2013). 政治意识形态:影响因素、心理机制及作用. 心理科学进展, 11.
- [4] 马得勇 (2007). 政治信任及其起源——对亚洲8个国家和地区的比较研究.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5.
- [5] 熊美娟 (2011). 社会资本与政治信任——以澳门为例.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4.
- [6] 徐有渔 (2006). 当代中国社会思想:自由主义和新左派. 中国社会科学论坛, 6.
- [7] 张 婧、王二平 (2010). 社会困境下政治信任对公众态度和合作行为的影响. 心理科学进展, 10.
- [8] 张书维 (2013). 群际威胁与集群行为意向:群体性事件的双路径模型. 心理学报, 12.
- [9] 张书维、王二平、周 洁 (2012). 跨情境下集群行为的动因机制. 心理学报, 4.
- [10] 张书维、许志国、徐 岩 (2014). 社会公正与政治信任:民众对政府的合作行为机制. 心理科学进展, 4.
- [11] 张书维、周 洁、王二平 (2009). 群体相对剥夺前因及对集群行为的影响——基于汶川地震灾区民众调查的实证研究. 公共管理学报, 4.
- [12] L. H. Hoffman & T. L. Thomson (2009). The Effect of Television Viewing on Adolescents' Civic Participation: Political Efficacy as a Mediating Mechanism.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 1.
- [13] L. Hu & P. M. Bentler (1999). Cutoff Criteria for Fit Indexes in Covariance Structure Analysis: Conventional Criteria Versus New Alternative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1.

- [14] R. Inglehart & P. R. Abramson (1994). Economic Security and Value Chang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
- [15] J. T. Jost, C. M. Federico & J. L. Napier (2009). Political Ideology: Its Structure, Functions, and Elective Affinities.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60.
- [16] T. T. Lee (2010). Why They Don't Trust the Media: An Examination of Factors Predicting Trust.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1.
- [17] M. Levi & L. Stoker (2000). Political Trust and Trustworthines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1.
- [18] W. Mishler & R. Rose (2001). What Are 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Trust? Testing Institutional and Cultural Theories in Post - Communist Societie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1.
- [19] Y. Mou, D. Atkin & H. Fu (2011). Predicting Political Discussion in a Censored Virtual Environment.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3.
- [20] B. E. Pinkleton & E. W. Austin (2002). Exploring Relationships among Media Use Frequency, Perceived Media Importance, and Media Satisfaction in Political Disaffection and Efficacy. *Mass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
- [21] T. Shi (2001). Cultural Values and Political Trust: A Comparis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aiwan. *Comparative Politics*, 4.
- [22] S. Wang, E. C. Tomlinson & R. A. Noe (2010). The Role of Mentor Trust and Protégé Internal Locus of Control in Formal Mentoring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
- [23] K. Y. Wong & H. H. M. Hsiao (2011). The Bases of Political Trust in Six Asian Societies: Institutional and Cultural Explanations Compare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3.
- [24] K. Y. Wong & P. S. Wan (2009). New Evidence of the Post-Materialist Shift: The Experience of Hong Kong.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3.
- [25] Q. Zhang & E. P. Wang (2010). Local Political Trust: The Antecedents and Effects on Earthquake Victims' Choice for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Social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7.

The Institutional-cultural Attribution of Political Trust and Its Effects on Cooperation with Government

Zhang Shuwei (Associate Professor, Sun Yat-sen University)

Jing Huaibin (Professor, Sun Yat-sen University)

Abstract: Political trust is a serious social problem in China. It is becoming an important issue on public administration. Institutional and cultural mechanism of political trust is just the focus of this paper. Based on survey data of 767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this research not only explores the antecedents of people's political trust, but also analyses its effects on cooperation and resistance with government.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1) both political appraisal and corruption perception consistently predict political trust; 2) central political trust is predicted by central political appraisal, central political efficacy, central corruption perception, social trust, political cynicism, authoritarianism and media trust; 3) local political trust is predicted by local political appraisal, local political efficacy, local corruption perception and authoritarianism; 4) political trust promotes individuals' cooperation with government and restricts individuals' resistance with government.

Key words: political trust;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 cultural perspective; cooperation; resistance

■ **作者简介:** 张书维,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讲师, 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研究员, 理学博士; 广东 广州 510275。E-mail: zhshuw2@mail.sysu.edu.cn。

景怀斌,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哲学博士。

■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7130117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3&ZD011); 中央高校基
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中山大学青年教师培育项目(13wkpy45); 中山大学“985工程”三期建设项目

■ **责任编辑:** 叶娟丽